

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

陈媛媛 邹月晴 宋 扬*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 2013—2018 年 72 个城区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描述了我国异地中考改革推进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流动人口子女在临近中考时留守的概率越高，且该影响在低技能家庭中更为明显。同时，随着子女年级上升，异地中考门槛对父母迁移决策的影响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本文的结果并不是流动人口样本自选择的结果。

关键词：异地中考门槛；流动人口；儿童留守

DOI：10.13821/j.cnki.ceq.2024.01.08

一、引言

自 2001 年中央政府颁布“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两为主”的指令以来，流动儿童在城市的义务教育入学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吴霓和朱富言，2014）。截至 2020 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 1 429.7 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达 85.8%。但随着劳动力市场对学历和技能要求的大幅提高，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上升，随迁子女异地参加中考与高考的问题日益突出。2017 年普通高中随迁子女招生人数只占 2014 年初中招生人数的 27.5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 年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报名高考的人数只占 2014 年初中招生人数的 16.46%，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4。目前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子女无法满足异地升学条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升学仍面临重重障碍。

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各地针对随迁子女在当地升学的具体条件陆续出台。异地中高考政策的目的是根据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升学需求，调整相应准入条件，使更多的流动人口子女能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然而，现实中门槛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和人口流入压力有关，即使在相同省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异地升学政策仍存在很大差异；同时，政策梳理显示，绝大部分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都要求随迁子女在本地有三年高中学籍，因此能否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是更为前置的问题（吴霓，2018）。但各城市在异地中考政策设计时，往往存在准入条件

* 陈媛媛、邹月晴、宋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宋扬，上海市武川路 111 号，200433；电话：15002521256；E-mail: song_yangsysy@163.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2034006）的资助，文责自负。

设定过高的情况,与流动人口的诉求仍有较大差距(吴霓和朱富言,2014)。其中,家长居住证和子女学籍是最基本的条件,还有相当一部分城市规定,家长需有稳定就业、稳定住房和社保缴纳证明,仅连续缴纳多年社保一条要求,就堵住了一大批随迁子女的异地中考路。

当流动人口子女面临升学限制时,让子女“随迁”还是“留守”是每个流动人口家庭都要面临的两难选择。随着儿童年级上升,不能满足异地中考要求但有升学需求的儿童只得返乡读书或在当地就读民办高中。民办高中学费高且学位少,流动人口家庭大多难以承担,因此这些儿童只能选择返乡读书。同时,在子女需回户籍地上学时,家长需要在城乡收入差异和亲子分离的成本之间做权衡,决定是否随子女返乡。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主要受工资和就业机会影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决定劳动力流向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夏怡然和陆铭,2015);并且,随子女年龄的增加,其独立性加强,对父母依赖程度下降;同时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父母更可能为了高收入选择留在城市。因此,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返乡的影响可能会大于对成人返乡的影响,最终导致儿童留守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留守儿童6693万人。现阶段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居高不下,破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困境是问题解决的根源。

不同城市异地中考政策错综复杂,研究异地中考政策对儿童留守影响,首先需要对我国各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构建一个系统的、可量化的指标体系。目前文献中关于异地中考门槛的研究大多仅落脚于文本政策的梳理(吴霓,2018),缺乏系统的量化指标体系和严谨的实证评估。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梳理全国72个城区人口100万以上城市的2013—2018年异地中考政策文件,构建异地中考门槛层次结构模型,计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与保护本地儿童升学权利有关,人口数量较大、经济较为发达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较高。从区域分布上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比其他城市更高;从时间趋势上看,2013—2016年三年过渡期中,异地中考门槛逐渐提高,2016年后,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维持高位甚至略有增加,其他城市的政策限制略有放松。由此可见,异地中考改革任重道远。

在实证检验中,本文使用2014—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分析异地中考门槛对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影响。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在流动人口子女年龄接近中考时,留守的概率越高。同时,异地中考政策具有技能偏向性,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此外,由于CMDS数据中仅包含留在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为了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我们使用201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异地中考门槛对成人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成人迁移决策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最后,我们对异地中考的限制条件进行拆解,重点分析了报名的身份限制和报考学校限制的影响,发现身份条件限制与普通高中报名限制均会显著增加儿童留守的概率,但若面临不能报考重点高中或随迁子女与本地生报考分数要求不同等其他报考学校限制,家长还是会让子女继续留在身边。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本文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建立了统一量化的、可跨地区跨时间对比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标体系,并对现有门槛指数的

计算方法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目前关于异地中考的文献多是通过政策梳理对门槛进行分类(杜永红和陈碧梅, 2012), 或者仅从是否可以报考普通高中、重点高中等做难度划分(王毅杰和黄是知, 2019; 陈宣霖, 2021), 无法精确地量化异地中考门槛在城市之间的差异。李红娟和宁颖丹(2020)构建了较细化的60个城市异地中考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但并未对不同年份的政策做区分。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并结合CMDS数据计算不同类别材料的获得难度差异, 以最大程度保证赋权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同时, 将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纳入同一指标体系, 改善了文献中这两种制度难以在同一指标体系中融合比较的问题(朱琳等, 2020); 并且, 采用多种指数构建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不仅为科学评估异地中考政策提供了依据, 还以新思路为政策门槛指数构建提供了较好借鉴。第二, 本文系统描绘了我国现阶段各城市异地中考改革推进的基本态势、区域差异与演变进程, 提炼了影响异地中考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 对地方政府降低异地中考门槛的驱动机制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可以为不同类型城市推进异地中考改革提供有针对性、差异化的科学参考依据。同时, 本文进一步将异地中考政策中的身份条件限制和报考学校限制进行拆分, 具体探析不同限制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留守决策的作用机制, 有利于厘清政策具体条款影响的一般规律, 为深化随迁子女异地中考政策改革提供具体的参考依据。第三, 本文首次从随迁子女升学政策的角度探究影响儿童留守的制度因素。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发现城市落户门槛通过影响教育资源可得性提高了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 吴贾和张俊森(2020)证实了义务教育入学限制是学龄前儿童留守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 落户门槛与义务教育入学限制都无法解释流动人口子女初中留守概率高于小学的现象。本文以异地中考为切入点, 在探究影响儿童留守制度因素的同时, 从政策的角度探讨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对于探讨移民政策与人力资本积累不平等的文献有重要的补充作用(Sieg et al., 2023), 对维护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计算

(一) 样本选择与文件来源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2年8月转发了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 要求各地于2012年年底出台详细的异地中考方案。2012年前虽然个别地区已着手解决随迁子女的异地中考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城市没有正式的异地中考方案或政策, 因此本文收集了2013—2018年的政策文本。样本城市的选择参考国务院2014年11月出台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依据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选取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72个城市。本文收集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各城市关于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 以及历年高中阶段招生报名工作通知和升学考试实施方案。文件来源为各省教育局、教育指导委员会官方网站, 各城市高中招生、义务教育招生宣传网站, 以及微信“本地宝”、新闻稿件等。

(二) 指标体系构建

在72个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中, 除上海采用积分制外, 其他均采用材料准入制。

报名异地中考的要求主要包含对考生家长条件与考生自身条件两方面的限制,具体包括对家长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合法职业、稳定住所和社会保险,对学生的学籍以及其他证明(包括出生证、计划生育证、预防接种证、原籍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信、书面报告)等八类材料的要求。此外,一部分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对可报考学校类型进行了限制,这种报考限制也反映了随迁子女高中升学的难度。本文将以上条件归为九个指标,并参照朱琳等(2020),按照各指标要求中的不同难度等级进行起始难度 s_i 的赋分,构建异地中考门槛层次结构模型,具体参见表1。^①

表1 异地中考门槛层次结构模型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要求	指标难度分 (s_i)
异地 中考 门槛	1. 身份证(父母双方需要乘以2)	不需要	0
		需要	1
	2. 户口本(父母双方需要乘以2)	不需要	0
		需要	1
	3. 居住证(父母双方需要乘以2)	需要一年	2
		需要二年	3
	4. 本地学籍	需要三年及以上	4
		不需要	0
		需要	1
	5. 合法职业(父母双方需要乘以2)	需要	1
		需要一年	2
	6. 稳定住所	需要二年	3
		需要三年及以上	4
		不需要	0
	7. 社会保险(父母双方需要乘以2, 只需要养老保险乘以0.7) ^a	需要	1
		需要一年	2
		需要二年	3
		需要三年及以上	4
	8. 其他证明	不需要	0
		需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计划生育证	1
需要原籍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接受 义务教育的证明信		2	
需要回原籍报考确有困难书面证明		3	
9. 报考学校限制	无限制	0	
	其他限制 ^b	1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	2	
	不能报考公办普高	3	

注: a. 一些地区仅对缴纳养老保险有要求;由于社保包含的五险之中,养老保险所占金额最大,约为70%到80%,因此养老保险的难度以社会保险难度乘以0.7计算。b. 其他限制指允许外地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但有其他特殊限制,例如长春允许外地考生报考本校高中部,但限制报考市区其他学校;成都对随迁子女与本地市民子女报考学校的分数要求不同。

^① 针对积分制城市(上海),门槛指数用满足政策要求的120分所需的最低条件计算;针对一些只要求考生拥有当地学籍或家长持有居住证的城市,如青岛、武汉等,以义务教育入学条件或申请居住证的条件,参照异地中考指标体系计算;对于部分采用积分制义务教育入学的城市,也参照异地中考积分制的做法,以满足入学积分的最低条件计算。

（三）指标权重计算

由于可以比较本文用于合成综合指数的原始指标获取的相对难易程度，为了使指标的权重分配与实际情况更相符，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来确定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门槛各指标的权重（郭峰等，2020；De Luca et al., 2021），操作步骤如下。第一，计算9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难易程度 $x_{i,j}$ 。当 $x_{i,j}$ 等于1时，说明指标 i 与指标 j 获取难度相同， $x_{i,j}$ 越大说明指标 i 比指标 j 的相对难度越大。指标具体难度赋分如下：以身份证和户口本为基准，将身份证和户口本难度赋分为1（ $x_{1,1}=x_{2,1}=1$ ）；将居住证和学籍的难度赋分为3（ $x_{3,1}=x_{4,1}=3$ ），这里只体现居住证或学籍要求的年限，对申请居住证和入学要求的具体条件在其他指标中另算；对政策要求的合法职业、稳定住所和社会保险，根据CMDS 2017年数据中符合这三项要求的人数比例区分难度，将合法职业赋分为5（ $x_{5,1}=5$ ）、稳定住所赋分为4（ $x_{6,1}=4$ ）、社会保险赋分为6（ $x_{7,1}=6$ ）；其他证明材料获得难度略大于身份证、户口本，赋分为2（ $x_{8,1}=2$ ）；报考学校限制指在一些地区对随迁子女可选择报考的学校类型进行了限制，例如北京和天津只允许报考中等职业学校。这种一刀切的政策限制对随迁子女高中升学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将其在整个指标体系中赋分最高为9（ $x_{9,1}=9$ ）。

第二，根据层次结构模型中指标的相对难易程度 $x_{i,j}$ 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用算数平均法计算归一化的指标权重 ω_i 。^①

（四）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

将城市 c 指标 i 的归一化得分 $D_{c,i}$ 与指标权重 ω_i 相乘并加总，得到城市 c 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Q_c ，数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异地中考准入条件越严格，计算公式如式（1）和式（2）所示：

$$Q_c = \sum_{i=1}^9 (D_{c,i} \times \omega_i), \quad (1)$$

$$D_{c,i} = (s_{c,i} - \min s_i) / (\max s_i - \min s_i), \quad (2)$$

其中， $s_{c,i}$ 为城市 c 的第 i 个指标的难度得分， $\max s_i$ 与 $\min s_i$ 分别表示第 i 个指标难度得分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五）异地中考门槛的区域与时间分布特征

本文计算了2013—2018年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指数。以2016年为例，72个城市的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门槛平均得分为0.1887，标准差为0.1023，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有28个城市，占38.89%。72个城市中北京分数最高，为0.5846；合肥分数最低，为0.0699。

从区域分布上看，不同类型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差距较大且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异地中考门槛与城市人口规模 and 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图1显示了采用各城市2013—

^① 为了缓解层次分析法赋权的主观性可能造成的偏误，本文借鉴统计学中参数敏感性分析的思想，在保证参数不突破现实边界的情况下，将每个其他指标相对身份证的重要程度加1或减1，并使用新的权重计算的异地中考门槛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2018年的异地中考门槛,以城区人口数量为分类标准,超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最高,特大城市其次,I型和II型大城市门槛较低。总体上看,异地中考政策较为严格的前十个城市中,涵盖了“北上广深”、成都等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

第二,异地中考门槛与保护本地儿童高等教育的升学权利有关。一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些高考洼地省份^①,由于考生数量较少及政策优惠的双重原因,本科录取分数线较低。为防止高考移民的恶意涌入,相较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这些城市设置的异地中考政策限制条件更多。从图1可以看出,同样是II型大城市,高考洼地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平均值为0.1918,显著高于II型大城市异地中考门槛的平均值。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地儿童的升学权利,一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和直辖市会设置较高的门槛。相关性分析显示,异地中考门槛与省内985高校数和211高校数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异地中考政策作为异地高考的前置政策,有限制“高考移民”、维护本地儿童升学权利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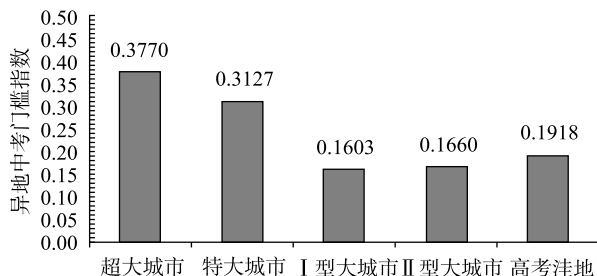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类型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从时间趋势上看,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在2013—2018年间并没有显著下降的趋势(见图2)。各城市从2013年年初出台异地中考政策开始,在三年过渡期中,异地中考门槛出现缓慢提高的现象,2016年后,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维持高位或略有增加,I型和II型大城市的政策限制略有放松。可见,《意见》发布后,城市更多的是规范随迁子女参加异地中考的途径与限制条件,并未真正为流动人口子女让渡教育资源,异地中考改革仍需持续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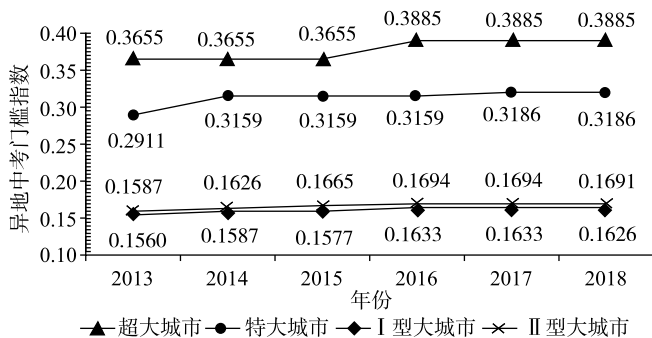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18年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变化

① 高考洼地一般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和海南省。

（六）不同的指数测算方法

层次分析法的优势在于权重测算比较直观，且各指标权重与实际难度较相符，但指标权重矢量确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避免指标设定造成的偏误，本文还使用因子分析法（尹志超等，2014）、等权重法、熵值法和投影寻踪法（张吉鹏和卢冲，2019）等客观赋权法重新对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进行测算。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门槛指数的分布相似，并且具有显著的相关性。^①

三、实证回归模型与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

识别异地中考政策对儿童留守的影响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异地中考门槛与城市的很多特征或其他政策相关，如果单独对该政策做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差。本文利用异地中考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差别，即儿童越接近中考，该政策的影响越大，而城市的其他特征或者政策对子女留守的影响不会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而增加。因此，为了识别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留守决策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年级与门槛的交互项，设定模型如式（3）：

$$kid_leftbehind_{icht} = \beta_0 + \beta_1 threshold_{c,t-1} \times kidgrade_{icht} + \beta_2 kidgrade_{icht} + \beta_3 threshold_{c,t-1} + \beta_4 X_{icht} + \beta_5 Z_{c,t-1} + p_c + c_h + r_t + u_{icht}, \quad (3)$$

其中，下标 i 表示流动人口子女， c 表示流入城市， h 表示户籍所在省份，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kid_leftbehind_{icht}$ 是子女 i 是否留守的虚拟变量，当该子女与被调查的家长不住在一个城市时取 1，否则取 0。城市异地中考门槛 $threshold_{c,t-1}$ 取滞后一期，这是因为 CMDS 数据于每年 5 月进行调查，这时子女留守与否取决于上一年的异地中考政策。^② 子女年级 $kidgrade_{icht}$ 根据出生年月计算，以当年 9 月 1 日前年满 6 周岁入读小学为准。本文着重关注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 β_1 。如果 β_1 的符号为正，表明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子女留守的概率随年级上升而增加得越多，即异地中考门槛增加了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概率。

由于子女留守的决策与父母技能、家庭经济情况等相关，模型同时控制了家庭特征 X_{icht} ，包含子女特征、户主特征和配偶特征。其中，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性别和子女个数；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医疗保险、户口性质、流动年限、家庭月收入 and 月支出；配偶特征包括配偶是否随迁、年龄、民族、受教育年限和户口性质。考虑到子女留守以及异地中考门槛的设置与流入城市特征有关，模型也控制了滞后一期的城市层面特征 $Z_{c,t-1}$ ，具体包括常住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商品房销售价格、普通高等学校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同时，模型加入了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p_c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c_h 和年份固定效应 r_t ，使用流入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① 层次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等权重法、熵值法和投影寻踪法计算的异地中考门槛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41、0.8697、0.8841 和 0.7002，且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② 这里假设家长会根据最新的政策对子女是否留守做出选择。考虑到子女转学成本和信息的滞后因素，采用子女小学或初中入学时的异地中考门槛或改变滞后期数，结果仍然稳健。

(二)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2014—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①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基准回归中的样本使用2016年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72个城市,限定流动人口子女为1至9年级,并剔除被调查父母不能生活自理、没有工资收入、在流入城市不到半年的样本。由于城市内部流动的人口不受异地中考政策的影响,本文仅包括跨市流动的样本。^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式(3)的OLS估计结果。第(1)列只控制了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第(2)—(3)列逐步加入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异地中考门槛和年级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年龄越靠近中考的儿童,留守概率越高。为了检验异地中考门槛造成初中阶段相比于小学阶段儿童留守概率的差异,第(4)—(6)列相应地将子女年级替换成子女是否处于初中阶段的虚拟变量^③。结果发现,初中阶段的虚拟变量和异地中考门槛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儿童因异地中考门槛而留守的可能性更大。^④

表2 异地中考门槛与儿童留守基准模型

因变量: 子女留守	(1)	(2)	(3)	(4)	(5)	(6)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25*** (0.007)	0.027*** (0.007)	0.027*** (0.007)			
初中阶段×异地中考门槛				0.168*** (0.042)	0.172*** (0.041)	0.172*** (0.041)
子女年级	0.012*** (0.002)	0.012*** (0.002)	0.012*** (0.002)			
初中阶段				0.050*** (0.010)	0.047*** (0.010)	0.047*** (0.010)
异地中考门槛	-0.133 (0.109)	-0.316 (0.230)	-0.325 (0.238)	-0.065 (0.105)	-0.231 (0.222)	-0.239 (0.230)

① 未使用2018年CMDS数据的原因是CMDS 2018年没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省份的信息。

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附录I。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③ 本文对小学初中的划分是五四制的城市(哈尔滨、大庆、上海、济宁、淄博和烟台)做了相应调整。

④ 后文所有结果将子女年级更换为子女处于初中阶段的虚拟变量,结果均保持一致,限于篇幅,作者留存备案。

(续表)

因变量：子女留守	(1)	(2)	(3)	(4)	(5)	(6)
样本数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R ²	0.271	0.289	0.289	0.270	0.288	0.288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后同；各列均控制了家庭特征和流入城市特征。

从总体上看，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其留守概率有所增加，且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这种现象越严重。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以 2016 年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均值分别为 0.388 和 0.177 来测算，和其他城市相比，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小升初阶段的留守概率会多增加 3.63% $((0.388-0.177) \times 0.172)$ ，占超大城市小升初阶段儿童留守比例总体增加幅度的 31.43% $(3.63\% / (53.33\% - 41.78\%))$ 。^① 如果超大城市完全放开异地中考限制，则小升初阶段儿童留守比例增加幅度将下降 57.78% $((0.388 \times 0.172) / (53.33\% - 41.78\%))$ 。需要说明的是，异地中考门槛可能会迫使一部分家长放弃子女升学，让子女初中毕业后在流入城市直接就业或就读民办高中而不需要留守，从这个角度看，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留守的总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年级子女受异地中考门槛影响的差异，附录 II 展示了各年级虚拟变量和异地中考门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异地中考门槛主要影响七至九年级流动儿童的留守决策，且随着子女距离中考时间的临近，异地中考门槛提高对子女留守概率的影响逐渐加大。

(二) 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异地中考政策大多是技能偏向型的，很多城市对稳定住所、合法职业或者定期缴纳社会保险等均有要求。表 3 按照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进行分组。第 (1) — (3) 列将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为大于等于 15、9 到 15 和小于等于 9 三组进行回归，第 (4) — (6) 列将样本分成家庭月收入在当年该城市流动人口家庭中高于 90% 百分位点、50%—90% 和低于 50% 三组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随着子女年级上升，异地中考门槛对父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子女留守的影响逐渐增大。由此可见，异地中考政策具有一定的教育歧视和收入歧视，流动人口技能水平逐渐成为城市分配公共资源的依据。异地中考政策技能偏向型的这一特征，与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和户籍政策类似（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杨娟和宁静馨，2019；张吉鹏等，2020）。

^① 根据 CMDS 数据，2016 年超大城市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比例分别为 41.78% 和 53.33%。

表3 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子女留守	受教育年限			家庭收入		
	≥15 (1)	9—15 (2)	≤9 (3)	高于90% (4)	50%—90% (5)	低于50% (6)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10 (0.012)	0.017** (0.008)	0.027*** (0.010)	0.019** (0.009)	0.025*** (0.008)	0.027*** (0.007)
子女年级	0.003 (0.005)	0.010*** (0.002)	0.013*** (0.002)	0.010*** (0.003)	0.011*** (0.002)	0.013*** (0.002)
异地中考门槛	-0.475 (0.388)	-0.205 (0.295)	-0.327 (0.214)	-0.063 (0.215)	-0.417 (0.335)	-0.281 (0.231)
样本数	4 640	28 866	76 615	8 954	53 013	48 154
R ²	0.551	0.317	0.277	0.290	0.273	0.306

注：表中各列均控制了家庭特征、流入城市特征、年份固定效应、流入城市固定效应和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后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方法

基准回归中使用了层次分析法计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表4分别使用因子分析法、等权重法、熵值法和投影寻踪法测算异地中考门槛，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

表4 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计算方法

因变量：子女留守	因子分析法	等权重法	熵值法	投影寻踪法
	(1)	(2)	(3)	(4)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06*** (0.002)	0.048*** (0.010)	0.017** (0.007)	0.022*** (0.007)
子女年级	0.017*** (0.001)	0.004 (0.003)	0.014*** (0.002)	0.010*** (0.002)
异地中考门槛	-0.052 (0.033)	-0.283 (0.178)	-0.005 (0.141)	-0.155 (0.110)
样本数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R ²	0.289	0.290	0.289	0.289

2. 排除义务教育入学政策的影响

吴贾和张俊森(2020)发现面临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会增加子女留守的概率。为了排除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本文结果的影响，表5第(1)列将样本限制在1—5岁的儿童做安慰剂检验，此时子女年级和异地中考门槛的交互项不显著。这说明异地中考政策对学龄前儿童留守没有显著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反映的并不是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对子女留守的影响。

3. 排除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

异地中考政策与异地高考政策同属随迁子女升学政策，两者之间高度相关且均可能影响子女留守。为了排除异地高考政策的影响，表 5 第 (2) 列将样本限制在 15—19 岁且正在接受高中教育的青少年，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龄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反映的并不是异地高考政策对子女留守的影响。

4. 排除高考洼地的影响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的是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专业计划招生，由此形成了基础教育相对不发达，或考生较少、招生录取率较高、录取难度低的西部偏远省份成为“高考洼地”。一方面，一些家长为了使子女获得更好的上大学机会，会带着子女迁移到这些地区，因此高考洼地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一般较高，且随着年级增加，子女随迁比例可能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如果流动人口的户籍地处于高考洼地省份，其可能更偏向于让子女返乡上高中，且随着子女年级增加，子女留守比例可能越来越高。为了确保实证结果不受高考洼地的影响，表 5 第 (3) 列剔除了流入地为高考洼地且为跨省流动的样本，第 (4) 列剔除了户籍地为高考洼地且跨省流动的样本，结果保持稳健。

5. 排除落户政策的影响

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发现，落户门槛会显著影响子女的留守，而通常落户政策较为宽松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也较低。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异地中考门槛导致的而非落户政策的影响，表 5 第 (5) 列将张吉鹏和卢冲（2019）计算出的城市落户门槛加入模型^①，子女年级与异地中考门槛的交互项仍显著为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落户门槛不重要。一般而言，落户门槛要高于异地中考门槛，影响的流动人口群体也不完全相同，对于无法实现落户的流动人口而言，其子女的留守受落户门槛影响较小，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更大。

6. 改变儿童留守的定义

基准回归中子女留守定义为子女与其被调查的父亲或母亲不在同一城市，而 2016 年民政部定义留守儿童为不与双方父母同住的儿童。此外，不与双方父母同住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更大。表 5 第 (6) 列和第 (7) 列分别检验了门槛对子女独自留守和与父母一方共同留守的影响，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主要影响的是儿童的独自留守，并没有显著增加父母一方选择跟着子女一起留守的概率。此外，我们区分了到户籍地留守和到其他城市留守，发现政策主要增加了到户籍地留守的概率。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和改变子女留守的定义

因变量： 子女留守	1—5 岁	15—19 岁 且在读高中	去掉流入地 为高考洼地	去掉户籍地 为高考洼地	控制落户 政策影响	子女独自 留守	子女与父母 一方留守
	(1)	(2)	(3)	(4)	(5)	(6)	(7)
子女年级×异 地中考门槛	0.016 (0.014)	-0.032 (0.022)	0.027*** (0.007)	0.026*** (0.007)	0.026*** (0.007)	0.027*** (0.007)	0.001 (0.001)

^① 落户门槛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网址为 <https://chfs.swufe.edu.cn/info/1009/1286.htm>，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0 日。

(续表)

因变量: 子女留守	1—5岁	15—19岁 且在读高中	去掉流入地 为高考洼地	去掉户籍地 为高考洼地	控制落户 政策影响	子女独自 留守	子女与父母 一方留守
	(1)	(2)	(3)	(4)	(5)	(6)	(7)
子女年级	-0.001 (0.003)	0.016** (0.006)	0.011*** (0.001)	0.012*** (0.002)	0.012*** (0.002)	0.011*** (0.002)	0.000 (0.000)
异地中考门槛	-0.180 (0.190)	0.295 (0.414)	-0.351 (0.239)	-0.335 (0.247)	-0.275 (0.266)	-0.326 (0.233)	0.023 (0.021)
样本数	65 700	19 583	104 795	106 733	97 385	110 121	81 298
R ²	0.298	0.256	0.290	0.291	0.281	0.189	0.894

注：第(1)–(2)列中子女年级表示子女年龄。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以下检验：第一，考虑到子女留守概率随年龄上升而增加还可能受城市层面其他因素的影响，将GDP、失业率、房价、价格指数、普通高等学校数、人均教育支出等城市层面变量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加入模型；第二，考虑到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可能和流入地异地中考门槛相关从而产生内生性，将父母生育年龄与子女年级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分年份单独回归；限制流入所在城市的时间（超过2年、3年、4年或5年）。^①

(四) 由成人流动导致样本选择性偏误的检验

由于CMDS数据仅统计了在当前城市的流动人口，使用该数据研究儿童留守的问题，可能会存在样本选择的偏差。因为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异地中考门槛可能导致部分重视亲子陪伴和子女教育的父母为了避免子女留守，做出以下三种选择：第一，举家离开流入城市；第二，流入异地中考门槛较低的城市；第三，不离开户籍地。这样，门槛较高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比例较大，可能只是一个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本小节采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对成人迁移的三种选择进行检验。

首先，为了检验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迁出所在城市的影响，表6第(1)列将样本限定在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②且2014年在外出流动的人口，研究其2014年所在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对其2015年是否流出该城市的影响。模型设定如式(4)所示：

$$\begin{aligned} outcity_{icht} = & \beta_0 + \beta_1 threshold_{c,t-1} \times kidgrade_{icht} + \beta_2 kidgrade_{icht} + \beta_3 threshold_{c,t-1} \\ & + \beta_4 X_{icht} + \beta_5 Z_{c,t-1} + r_c + \delta_h + u_{icht}, \end{aligned} \quad (4)$$

其中， $outcity_{icht}$ 表示劳动力*i*是否从一年前流入城市*c*迁出的虚拟变量， $threshold_{c,t-1}$ 表示劳动力一年前流入城市*c*的异地中考门槛， $kidgrade_{icht}$ 表示子女年级。模型中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 X_{icht} ，一年前流入城市特征变量 $Z_{c,t-1}$ ，一年前流入省份的固定效应 r_c 和

① 具体结果见附录III，结果均稳健。

② 若有多个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取最大的子女年级。

户籍所在城市固定效应 δ_h ，并使用一年前流入城市的聚类标准误。结果显示，异地中考门槛和子女年级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随子女年级的上升，流动人口流出所在城市的决策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其次，考虑到所有城市都是流动人口的选择空间，参考夏怡然和陆铭（2015），表 6 第（2）列将样本限定于 2015 年在外流动的个体，检验随着子女年级的变化，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入城市选择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具体采用条件 Logit 模型，设定如式（5）所示：

$$P(\text{chosen}_{ict} = 1) = \frac{\exp(\beta_1 \text{threshold}_{ic,t-1} \times \text{kidgrade}_{ict} + \beta_2 \text{threshold}_{ic,t-1} + \beta_3 Z_{ic,t-1})}{\sum_{c=1}^C \exp(\beta_1 \text{threshold}_{ic,t-1} \times \text{kidgrade}_{ict} + \beta_2 \text{threshold}_{ic,t-1} + \beta_3 Z_{ic,t-1})}, \quad (5)$$

其中，每个劳动者 i 都面临 C 个城市的选择集， chosen_{ict} 表示劳动力 i 是否流入可选城市 c 的虚拟变量。 $\text{threshold}_{ic,t-1}$ 表示劳动者 i 可选城市 c 滞后一期的异地中考门槛， kidgrade_{ict} 表示子女年级， $Z_{ic,t-1}$ 表示劳动者 i 可选城市 c 滞后一期的其他特征，模型中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门槛对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影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IIA 检验的结果中剔除某一选项后统计结果没有显著变化（ p 值大于 0.1），说明条件 Logit 估计具有可信度。

最后，为了分析政策对居住在户籍地的个体选择是否外出的影响，表 6 第（3）列将样本限定在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且一年前（2014 年）在户籍地的个体，检验子女年级对现在（2015 年）其是否外出的影响，模型设定如式（6）所示：

$$\text{outhome}_{iht} = \beta_0 + \beta_1 \text{kidgrade}_{iht} + \beta_2 X_{iht} + \delta_h + u_{iht}, \quad (6)$$

其中， outhome_{iht} 表示被调查者 i 是否从户籍所在城市 h 流出的虚拟变量， kidgrade_{iht} 表示子女年级。模型中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 X_{iht} ，户籍所在城市固定效应 δ_h ，使用户籍所在城市的聚类标准误。结果显示，子女年级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家长外出的概率逐渐增加，因子女可能面临的异地中考问题而选择不流出户籍地的情况并不普遍。

表 6 异地中考门槛对成人流动的影响

因变量	是否流出一年前流入城市 (1)	选择流入城市 (2)	是否流出户籍地 (3)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门槛	-0.026 (0.017)	-0.015 (0.027)	
子女年级	0.010 (0.006)		0.001** (0.000)
异地中考门槛	0.314 (0.200)	-0.138 (0.448)	
样本数	5 339	586 347	27 489
(Pseudo) R^2	0.399	0.176	0.873
Log likelihood		-37 264.850	

以上结果均表明,随着子女年级的上升,成人流动决策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因此异地中考门槛增加子女留守的结果,并不是由成人流动导致的样本自选择偏误造成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劳动力迁移主要与流入地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有关,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吸引他们的最主要动因(夏怡然和陆铭,2015);第二,子女随着年龄增加其独立性更强,对父母依赖程度下降;第三,随着子女年龄增加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父母更倾向于为了收入而不得不让子女留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表明异地中考门槛对成人流动完全没有影响,如果成人早在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之前就做出流动决策,本文的模型无法识别。

(五) 进一步讨论:对政策不同限制条件的影响分析

为了剖析不同的政策细则对子女留守的影响,我们将异地中考政策条件按照报考的身份条件限制和报考学校限制分别进行评估。对原有异地中考指标中除报考学校限制外其他八个原始指标重新赋权,计算仅反映对身份要求的异地中考身份门槛,并通过设置两个虚拟变量衡量城市的报考限制: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和其他报考学校限制,后者包括不能报考重点高中或与本地生录取分数不同等限制。

表7第(1)列在模型中仅考虑身份门槛与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限制,第(2)列仅考虑身份门槛与其他报考学校限制,第(3)列同时把这三类限制放入模型。结果表明,儿童留守主要受报名异地中考的身份限制和是否可以报考公办普通高中限制的影响,但是如果只是对于报考重点高中有限制,或者与本地儿童分数线有差异,家长还是会设法让子女继续留在身边。根据第(3)列的系数估算,若城市存在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限制,相当于提高 $0.003/0.034=0.088$ 的异地中考身份门槛;以社保为例,相当于将父母单方社会保险(标准化赋分为0.03)的年限要求提高 $0.088/0.03=2.93$ 年。

表7 异地中考身份条件限制与报考学校限制对儿童留守的影响

因变量:子女留守	(1)	(2)	(3)
子女年级×异地中考身份门槛	0.033*** (0.008)	0.034*** (0.008)	0.034*** (0.008)
子女年级×不能报考公办普高	0.003* (0.002)		0.003* (0.002)
子女年级×其他报考学校限制		0.001 (0.003)	0.002 (0.003)
子女年级	0.009*** (0.002)	0.009*** (0.002)	0.008*** (0.002)
异地中考身份门槛	-0.253 (0.160)	-0.258 (0.160)	-0.257 (0.160)
不能报考公办普高	0.131 (0.128)		0.062 (0.091)

(续表)

因变量：子女留守	(1)	(2)	(3)
其他报考学校限制		-0.147 (0.130)	-0.075 (0.054)
样本数	110 121	110 121	110 121
R^2	0.290	0.290	0.29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子女是我国未来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解决好他们在流入城市的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与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夯实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本文通过搜集各城市异地中考的政策文件，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我国 72 个大城市 2013—2018 年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数据显示，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的设定，与保护本地儿童升学权利和人口控制的压力有关。在 2013—2016 年三年过渡期结束后，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维持高位或更有增加，其他城市的政策略有放松，推进异地中考的改革道阻且长。

本文实证检验了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影响，结合 2014—2017 年 CMDS 数据，发现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在越接近中考时留守的概率越高，且该影响在低技能家庭中更为明显。同时，本文通过检验流动人口家庭父母的迁移决策，排除了由于成人流动而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最后发现，异地中考报名的身份条件限制与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限制显著增加了儿童留守的概率。

现阶段，异地中考门槛作为各城市用来保护本地儿童升学权利和保证城市教育资源有序配置的“计划性”工具，一步到位开放异地中考并不现实，要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升学问题，应寻求制度的突破，具体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各城市应该厘清流动人口子女的规模和相应学位需求，因地制宜设定适合自己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面临巨大人口流入压力的发达城市可以在扩大高中学位供给的基础上，有序地降低门槛；其他城市则应尽快破除随迁子女升学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对于不符合异地中考要求的随迁子女，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应该积极做好政策衔接，为考生返乡参加升学考试提供保障。第二，本文研究表明，只能报考职业高中但不能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限制显著增加了儿童留守的概率。国家一方面应取消歧视性的录取规则，另一方面，需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职业教育升学途径，尽早打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陈旧观念。第三，异地中考作为异地高考的前置政策，两者具有很强的协同性。在调整异地中考政策的同时，也应加快异地高考制度的改革，打破各省之间高考招录的差异，保证不同地区高考录取的公平性，以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组合的整体效果。

参考文献

- [1] 陈宣霖,“异地中考政策促进随迁子女选择高中教育吗”,《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1期,第75—81页。
- [2] De Luca, G., D. Lisi, M. Martorana, and L. Siciliani, “Does Higher Institutional Quality Improv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Healthcare Provi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1, 194, 104356.
- [3] 杜永红、陈碧梅,“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政策支持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12年第5期,第21—24页。
- [4]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第1401—1418页。
- [5] 李红娟、宁颖丹,“异地中考政策的区域差异及思考——基于60个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教育测量与评价》,2020年第1期,第29—34页。
- [6] Sieg, H., C. Yoon, and J. Zhang, “The Impact of Local Fiscal and Migration Policie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3, 64 (1), 57-93.
- [7] 王毅杰、黄是知,“异地中考政策、父母教育参与和随迁子女教育期望”,《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67—80页。
- [8] 魏东霞、谌新民,“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第549—578页。
- [9] 吴贾、张俊森,“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38—155页。
- [10] 吴霓,《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考试的政策与实践研究——基于10城市的调研》。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
- [11] 吴霓、朱富言,“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考试政策分析”,《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第43—52页。
- [12]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第78—90页。
- [13] 杨娟、宁静馨,“以教控人是否有效?——基于北京、上海两地抬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政策的比较分析”,《教育与经济》,2019年第1期,第65—74页。
- [14]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第62—75页。
- [15] 张吉鹏、黄金、王军辉、黄勳,“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第175—190页。
- [16] 张吉鹏、卢冲,“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4期,第1509—1530页。
- [17] 朱琳、冯思澈、马啸,“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友好程度研究——基于16个城市政策文本的分析”,载于韩嘉玲主编《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3—87页。

Barriers to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and Children of Migrants Being Left Behind

CHEN Yuanyuan ZOU Yueqing SONG Y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We construct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barriers f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of migrant children from 2013 to 2018 in 72 c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the policy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We find that in cities with higher barriers, the probability of children being left behi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s they are approaching to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and this impact is higher among low-skilled families. Moreover,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 barriers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parents as their children's grades increase, indicating that the baseline results are not driven by self-selection of migrants.

Keywords: barriers to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migrants; children being left behind

JEL Classification: I28, J13, O15

* Corresponding Author: Song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15002521256; E-mail: song_yangsysy@163.com.